

唐人小说中的奇幻女性形象探析

田俊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摘要] 唐人小说以虚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既具有世俗女性的优长,又拥有特异能力的奇幻女性形象,这些奇幻女性形象可分为女仙、女妖和女侠三大类型,其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真实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的婚恋状况,同时也折射出唐代士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及个人理想。

[关键词] 唐人小说;女性形象;虚构手法;奇幻色彩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5-0138-04

Fantastic Female Images in the Novels of Tang Dynasty

TIAN Junji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pei District,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s of Tang Dynasty created series of fantastic female images who possess not only secular merits but also excellent ability. These female im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female fairies, female monsters and female knight-errants. Their lives show the situation of love and marital status of Ta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eir lives reflect the attitude towards life, the conception of value and personal ideal of the Scholars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novels of Tang Dynasty; female image; fictional techniques; fantasy

韩云波先生曾说过:“小说文体正式发生有两个必要前提,但唐前小说显然都缺乏这两个前提。一是有意为之的虚构……二是价值生活的表现。”^[1]此见解十分精辟,它表明:小说发展到唐代,才开始真正同时具备有意虚构和表现价值生活两个前提条件。魏晋六朝小说家尚未意识到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即使他们作品中存在虚构成分,他们仍坚信自己是在作生活实录。如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强调,在创作之前自己虽“非一耳一目之所清睹”,但也先“考志于载籍”然后“访行事于故老”。可见,魏晋六朝小说仍徘徊于文史之间,具有文史双重性。到了唐代,小说创作逐渐摆脱了史传文学的束缚,小说家们开始有意将虚构的手法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随着时间推移,虚构逐渐成为唐人小说女性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法之一。

政治局势的动荡,封建礼教的重压,潦倒生活的逼迫,社会环境的刺激在唐代士人的心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他们在小说中大量运用虚构的表

现手法,为世人构筑了一个虚幻奇异的仙妖精怪世界,借以传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念想。因此,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奇幻色彩的女性形象,她们成为士人们表达心声的理想方式。

一 虚构——唐人小说奇幻女性形象的主要塑造手法

“虚构是小说叙事本质之一”^[1],虚构是使事件故事化的关键,小说的艺术魅力彰显在艺术虚构之中。唐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为虚构观念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使虚构成为唐人小说人物塑造的主要手法之一。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民族融合,思想开放,文化昌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促成了错综的社会关系,催生了五花八门的奇闻趣事,为唐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奇异的素材。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的审美趣味日益世

收稿日期: 2013-05-28

作者简介: 田俊杰(1983-),男,湖南凤凰人,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俗化,他们的“好奇”之心逐渐趋向于世间的“奇事”,唐人小说“尽设幻语”的创作方式,正好满足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在此种环境中生活的唐代小说家则“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确立了感性思维模式。”^[2]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取意好奇,驰骋丰富的想象力,开拓广阔的想象空间,使小说摆脱了史传文学实录的束缚,虚构出人间、地狱的种种幻境”^[2]。如《离魂记》中倩娘与表兄王宙两相爱慕,互为知己,当得知父亲将她许给他人,于是“女闻而郁抑”,王宙也愤而借故远行。倔强的少女不甘于此,她的灵魂居然能离开躯壳,追随王宙而去,她解释自己的行动时说:“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3][51]}在此,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想象、虚构的才能,以虚幻的形式、浪漫的手法,成功地塑造出倩娘坚贞、忠诚、敢于反抗和追求的形象。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离魂的事情,作者借助幻想虚构出少女离魂的奇幻世界,使故事变幻多端的同时,也使倩娘身上带有几分奇幻色彩。

同时,唐代佛道盛行,佛道思想中的成仙升天、六道轮回、天堂地狱等观念为人们熟识。唐代小说家“从佛道两教的典籍中吸取了许多营养,诸如神异奇变的幻术、变化莫测的神鬼故事、遇仙故事等,从而创造出诡丽奇绝的艺术境界,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人的欲念、理想 and 情思”^[2]。如《枕中记》看似在描述卢生“黄粱美梦”的过程,实则借此宣扬道家的无为思想。卢生在吕翁面前感叹自己命运多舛。之后在睡梦中,他梦见自己宦海起伏及由盛转衰的生命过程。梦醒后,他对吕翁感慨道:“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止吾欲也。”^{[3][40]}在此,卢生悟出荣辱、得失、生死,都如梦境一般虚无缥缈,因此,人们的追求是虚幻的,应顺应自然,无欲无求。作者在此借用道家无为思想,将虚幻而美好的梦境与残酷的现实相结合,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也为人物形象附上了某种奇幻色彩。

可见,唐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佛道思想的盛行,催生了唐人小说家的虚构意识;人们“好奇事”的文化审美心理为唐人小说家的“尽设幻语”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因此,虚构就成为唐人小说家编制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法之一。也正是由于他们经常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虚构的表现手法,唐人小说中故事往往变幻多端,女性形象时常散发出奇幻色彩。

二 唐人小说奇幻女性形象的类型及表现

唐人小说家在小说中大量运用虚构手法并非

为了玩弄艺术技巧,而是要通过虚构的手法来表现唐代士人的价值观念,这是唐代小说家匠心所在。他们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想象和联想,对各种素材进行合理虚构,因此,唐人小说中充满了浪漫主义和奇幻色彩。

唐代士人也曾追求过美好的爱情,憧憬过美满的婚姻,呼唤过壮志共酬的红颜知己,然而封建礼教抹杀他们的情感与欲望,给他们留下了无尽的困惑与焦虑,于是他们通过小说中虚构的女性形象来求得心理和生理上的补偿。因此他们大胆想象,以幻还真,虚构出一个个异于现实世界并能自成系统的“奇幻世界”,借此表达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欲念、理想 and 情思。正因如此,他们笔下的女性多美丽而痴情,既集世俗女性的一切优长,又是理想女神的化身,充满了奇幻色彩。这些奇幻女性形象,寄寓了唐代士人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及个人理想,体现了他们深沉的文化心理内涵。唐人小说中具有奇幻色彩的女性主要有女仙、女妖及侠女三类:

(一) 女仙——唐代士子对欲望的幻想性满足

“唐代士人笔下的女仙,风情万种、美丽动人。”^[4]她们对男主人公往往情深意切。男主人公也多为相貌出众、文采风流之辈,他们一旦与女仙相遇,女仙们会毫无保留地为他们付出情爱、金钱、名利、肉体,甚至帮助他们入仕成仙。在此,女仙们成为男主人公沟通天入世界的桥梁和实现人世欲望的踏脚石。

如张鷟《游仙窟》中的男主人公虽“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都,饱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看弄玉。”^{[5][3]}但意犹未尽,仍不断四处猎艳,这充分体现了主人公借助对女色的征服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心态。所以,他才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个“香风触地,光彩遍天”^{[5][1]}的仙窟,此后他遇见了美若天仙的崔十娘。男主人公的言谈充满了调情之意,毫不掩饰贪恋十娘美色的意图。初入崔宅,男主人公闻箏声,便咏一诗:“自隐多姿则,欺他独自眠。故故将纤手,时时弄小弦。耳闻犹气绝,眼见若为怜。从渠痛不肯,人更别求天。”^{[5][2]}见女主人公遮面相见后。再以诗示好:“敛笑偷残靥,含羞露半唇。一眉犹叵耐,双眼定伤人。”^{[5][2-3]}当女子冷淡回绝:“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5][3]}后,男主人公彻夜难眠,于是写下叙风流怀抱,表倾慕之情的书信。十娘正式接见男主人公时,欲拒还迎、眉目传情的美态隐含挑逗性,刺激了男主人公欲望,这实际是唐代士人狎妓生活的真实写照。唐代盛

行狎妓之风,名妓更是让士子趋之若鹜,能与名妓们饮酒赋诗是才华和地位的象征。但是,想结识一位如十娘一般才貌双全的名妓,必须花费重金,而众多贫寒之士,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笔“艳遇”的费用。但女仙们不同,她们与男主人公不存在钱色交易,感情也更加真挚深厚,因而士人们的虚荣心和性幻想也更容易得到满足。

“《游仙窟》不是作者某次艳遇的实际写照,完全出于的虚构,其中的爱情描写是作者意想中的爱情,所以这种情缘是短暂的、悲剧性的,这种结局与人神恋爱的结果十分相似。”^[6]这类女仙给孤独的男主人公带来了一段没有后顾之忧的甜蜜爱情。这是唐代士人们渴望的婚外性行为,当他们在现实中遭到挫折和失意后,便虚构出温柔体贴的仙女来满足虚荣心。因此,女仙们身上就被披上了一件具有奇幻色彩的神秘外衣。

(二)女妖——唐代士人婚姻中情与理的挣扎

在唐人小说中,除人仙遇合外,还存在大量人妖相遇的情形。女妖们艳丽多姿、诡异神秘,既充满诱惑力又隐藏危险性,她们成为士人心中既爱又惧的复合体。

《孙恪》中的袁氏“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7]3638}她察觉到被孙恪偷窥时便问道:“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7]3638}在得知孙恪前来借宿后,她便客气地说:“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7]3638}少女的羞涩与礼貌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随后她让婢女进奉茶果,并替孙恪打扫居室、安置行李,这是袁氏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的行为体现。袁氏嫁于孙恪十余年间“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7]3639}实属典型的贤妻良母。然而,她并非柔弱任人欺辱之人。当丈夫听信表兄谗言,携剑向她问罪时,她怒指丈夫:“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馀,岂能立节行于世也。”^{[7]3639}接着她又“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在丈夫惊惧至极时,她一改之前的态度,并面带微笑地安慰丈夫:“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海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7]3640}在离别之际,她“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7]3641}化身为猿后。在此,袁氏的情与理、刚与柔、人性与野性得到完美展现。

唐人小说中,描写女妖人性与野性的冲突还有

其他篇章。如《焦封》中的女猩猩精,在同伴唤之归山时,便抛夫弃子,“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8]又如《申屠澄》中的虎女为人妻后,由于对山林自然生活的思慕和怀念,于是披上虎皮,大笑而去。女妖们美丽柔情、知书达理、勤劳贤惠,她们时常将家事打理得井然有序,是传统贤妻良母的典型。孙恪与袁氏结婚后,由一位穷困潦倒秀才变成纵酒放歌、挥金如土的逍遥士子。袁氏勤严持家、相夫教子,孙恪很少为家事操心。申屠澄的虎妻也是知书达礼之人,教出的子女个个出类拔萃。焦封之妻不仅使他变得富贵,而且对他一往情深,即使得知焦封一去不返,仍全力支持他的决定。

然而,女妖的天性使她们抛夫弃子,宁愿变回原形回到无拘无束的自然中去。这源于唐代士子深谙现实中两性的巨大隔阂,并明白无法消除这种隔阂。因此,他们只能创设以女妖抛夫弃子而离去的方式为结局,这正好反映了士子们对自己所设想的美满婚姻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充满了迷茫。这种虚构的完美婚姻,实质上是男权社会中世人对理想婚姻的追求。他们在幻想中仍坚持男性权威的标准,而忽视女性在婚姻中的种种需求,这就注定了两性之间的矛盾和隔阂难以消除,经过长期累积,终将分道扬镳。女妖作为人性与野性的统一体,正好与唐代两性隔阂的现实相契合,因此,唐人小说家在幻想中虚构出具有奇幻色彩的女妖形象,来表达士人们的理想与情思。

(三)女侠——唐代士人对红颜知己的呼唤

“安史之乱成为大唐盛世一个无法苏醒的噩梦,从此士人们眠花宿柳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虽然经过中唐的重新粘合,但是在士人心中留下的伤痕难以愈合。”^[9]动荡的社会打破原有的秩序,为两性关系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新的机遇,士人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了新的转变。在残酷的战乱中,人命如草芥;身世之感、家国之忧尚且难平,风花雪月、莺歌燕舞的不羁生活开始消退,士人们渴望的是壮志共酬的红颜知己、救亡图存的助手。于是他们在女性身上增添了许多原本属于男性的责任和义务,如忠、勇、信、义等。因此,许多武艺超群、精通法术、智勇双全、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的女侠形象在唐人小说中被虚构出来。

《红线》中“红线,潞州节度使薛篙青衣。善弹阮,又通经史,篙遣掌楼表,号曰‘内记室’”。^{[10]378}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红线才艺兼修、博通经史,其身份是潞州节度使“记室”,“记室”是薛篙幕府中重要的文职官员,她的日常工作是“掌腹表”,足见节度使对其的倚重。受到“身厌绮罗,口穷甘鲜,

宠待有加,荣亦至矣”^{[10]378}的待遇,红线尽其全力辅佐府主,“冀减主忧,敢言其苦”,透露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息。当时,正遇上田承嗣进兵边境,薛嵩自觉难挡强敌,因此“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10]378}红线在得知主人“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业尽矣”^{[10]378}的忧虑后,主动请缨:“易尔。不足劳主忧。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势,觐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其他即俟某却回也。”^{[10]378}临行前红线“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10]379}这种装扮乃女侠夜行的服饰典型。至魏郡后,红线夜里盗取了田承嗣的金盒;次日又使人将金盒归还,随后田承嗣退兵。红线不费一兵一卒,仅仅凭借个人智慧和才干就平息了危机,消弭兵祸于未发,做到“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10]380}这分明就是一位有着济世安邦之才的贤达之士,她身上具备挽狂澜于既倒的经纶之才,也体现传统士人救万姓于水火的兼济之志。

《聂隐娘》中聂隐娘是唐人小说中另一位杰出的侠女形象。她是“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10]395}10岁时被一尼姑看中,携至深山修炼法术,5年后还家。聂锋病故后,聂隐娘为魏博节度左右史。几年后“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10]397}刘昌裔能神算,知道有人前来行刺,于是派人来日早至城北,衙将见隐娘夫妻曰:“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隐娘夫妻见到刘昌裔说“合负仆射万死。”刘仆射不但没有怪罪他们,反而安慰他们“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10]397}他们被刘所感动,投其幕下,帮其抵御陆续而来的刺客,一日聂隐告诉刘仆射“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魏帅枕前,以表不回。”^{[10]397}此举表明隐娘另择明主的坚定,也表明其行事果断彻底的作风。不久刺客空空儿前来行刺,“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蹊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10]398}对方派出了顶尖高手,隐娘比之不如,但是隐娘经过精心谋划,使自己和主公逃离了这场劫难,并使远胜自己的对手逃逸千里,彻底消除了祸患。可见,隐娘坚持道义,对主人忠心耿耿,同时也体现出其智勇双全。最终隐娘不愿跟随主人上京谋取荣华富贵,甘愿“自此寻山访水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10]398}表现出隐娘清高自守的生活态度

以及洒脱自由的心态,展现了其自立自主、自由逍遥的侠女形象。

社会的巨变严重地挫伤了唐代士人昂扬的信心,他们开始改变了以往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在四处漂泊的乱世之中,他们幻想着一位能与自己平等对话、互相支持的红颜知己出现。然而,唐人小说中虚构的女侠,与她们真实的女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虚构性越大,矛盾就越突出。因此,被虚构出来的女侠,只是士人们理想中带有几分奇幻色彩的红颜知己。

综上所述,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佛道思想的盛行,促成了唐人小说家的虚构意识;人们“好奇事”的审美趣味则为虚构表现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于是虚构成了唐人小说家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面对时局的动荡,封建礼教的压制,潦倒生活的逼迫,唐代士人们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寻觅到心灵寄所。他们只能借助虚构的手法,构筑虚幻奇异的女性来述说内心真实的体验和情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就出现了大量即集世俗女性优长,又极具神秘性的女仙、女妖及侠女等奇幻女性形象。这些富有奇幻色彩的女性形象,为后世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提供了典型素材,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韩云波.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94-100.
- [2] 陈艳秋.从魏晋小说到唐人传奇——论唐人小说观念的演进[J].文化研究,2009(3):142-143.
- [3] 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 杨清媚.唐人小说中的女性及唐代士人心态分析[J].文艺学研究,2003(11):192-197.
- [5] 张 鹭.川岛点校[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 [6] 鲍震陪,于艳华.邂逅风流:唐代小说《游仙窟》的世俗化特征[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2-126.
- [7] 李 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8] 陈周昌.唐人小说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05.
- [9] 王 昕.论唐人小说中侠女形象及其影响[J].文学评论,2009(3):157-161.
- [10] 徐士年.唐人小说选[M].北京:中州书画社,1982.

责任编辑:黄声波